

K835  
LQL/1

#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编写组编

刘启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编写组编

刘启林 主编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县宏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开本 12.125印张 326千字

印数0001—4000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

ISBN 7—80050—302—X/C·31 定价: 7.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刘启林

自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一书出版以后，许多看过那本书的朋友都希望我们把这件工作继续下去。在大家的鼓励下，经过大约二年的时间，我们又编辑了这本《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作为前一本书的续篇。

从古至今，中国之所以出现一代又一代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这是整个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哺育的结果。没有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产生从先秦诸子到当代众多的著名学者。反过来，没有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大家，也就不会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达到如此光辉灿烂，受到世人如此崇敬的程度。学者和文化的关系，从来是密不可分的。从研究历史文化来看，要想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只能通过研究历代学者的思想和学说来进行。要想了解当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需要对当代学者们的思想和工作有所认识。把握学者的学术思想，首要的当然是读他们的著作。但光靠读他们的著作有时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编辑这本书，就是希望能帮助读者多了解一些著名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历程，了解一些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同时也了解一点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并不准备用有限的篇幅全面介绍著名学者的生平，而是想着重阐述他们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

本书所介绍的二十五位学者，出生最早的生于上个世纪末期，逝世最晚的卒于本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正象前一本书所介绍的学者一样，也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其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工

作过。他们都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这些学者的出身不同，从事学术活动的经历也有很大差别。但他们都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学者中，有些人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他们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中比较早的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代。更多的人起初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出于对历史和文化的热爱，立志埋头书斋，钻研学问。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学者，都不能回避旧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他们既对外国入侵者的强盗行径满怀愤恨，又对国家的贫穷落后焦虑不安。他们都希望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从这些著名科学家身上，看到了强烈的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的情感。虽然这些学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有一些差别，但他们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学者对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并对学术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视野。他们开始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富强的意义。许多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投身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的各种活动之中。他们真诚地想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情感，完全与国家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新中国的每一项成就，都使他们感到自豪。而工作中许多不应有的失误，又使他们痛心疾首。有些学者即使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没有动摇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和信心。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手段的不完备，要想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许多学者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毕生奋斗不止。即使研究工作取得成果，一般也不会给学者带来丰厚的物质享受。清贫是大多数学

者的生活写照。淘金者是不会涉足学术领域的。但许多学者为了学术，宁肯把自己物质上的需要压缩到最低限度，而对工作却锲而不舍。他们大都用生活上的清贫，换来精神上的充实。

社会科学的每一点成就，都必须建立在研究者丰富而扎实的知识基础上。本书所介绍的学者中，许多人对中西文化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先是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又到国外下功夫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化。因此，不管在哪一学科领域，他们的研究工作，都能鲜明地保持和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能很好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他们的研究工作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十分注意把古今中外融为一体，表现出很深的学术功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这些著名社会科学家，对自己所从事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今受到人们的崇敬。

本书所编入的各篇文章，大都是学者的朋友和晚辈撰稿的。这些作者比较熟悉自己所介绍的学者，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能够提供许多旁人所不掌握的翔实材料。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有些人又查阅了大量报刊上已经发表的文章，参考了许多人的观点和材料。

本书收入的二十五位著名学者的传记，是按他们出生年月的顺序排列的。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牛立志、赵烽、吴友文、方约都是老同志，年龄最大的已经八十岁了。其中赵烽同志积极倡议编写此书，并参与了本书的组稿工作。由于她的推动，此书终于完成。但她没能等到这本书出版，就在1990年秋病逝了，对此我们是深感惋惜和悲痛的。



## 目 录

前言 .....	刘启林 ( I )
王伯祥 .....	吴庚舜 ( 1 )
包尔汉 .....	任一飞 ( 15 )
周新民 .....	黄明川 ( 27 )
孙楷第 .....	杨 镰 ( 43 )
郑振铎 .....	陈福康 ( 52 )
罗常培 .....	刘 坚 ( 74 )
俞平伯 .....	陆永品 ( 88 )
吕振羽 .....	叶桂生 ( 109 )
陈翔鹤 .....	白 鸿 ( 129 )
谢国桢 .....	商 传 ( 158 )
贺昌群 .....	贺龄华 ( 171 )
罗念生 .....	罗锦鳞 赵淑宝 ( 186 )
吴伯箫 .....	秦 弓 ( 199 )
沈有鼎 .....	诸葛殷同 ( 218 )
丁声树 .....	韩敬休 ( 225 )
梁寒冰 .....	孔令士 ( 239 )
宦 乡 .....	薛谋洪 ( 254 )
孙毓棠 .....	余太山 ( 277 )
傅懋勤 .....	道 布 ( 289 )
黎 澍 .....	陈文桂 ( 302 )
熊德基 .....	刘 驰 ( 318 )
牙含章 .....	杨荆楚 ( 332 )

# 王 伯 祥

吴庚舜

在我国现代文化名人中，有的倾毕生之力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里辛勤耕耘，做出了重大贡献，王伯祥先生就是这样的著名学者之一。

王伯祥，原名王钟麒，字伯祥，号碧庄、巽亭、苏亭、容堂、虹翰、旃叟，晚年以字行。1890年2月27日，生于江南文化名城苏州。这年为清光绪十六年，上距“鸦片战争”三十余年，下至“五四运动”二十七年。当时，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的兴亡，革命者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其他有识之士也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这个时期，文化教育领域中爱国思想的传播为王伯祥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

王伯祥生长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亲王沛田是个读书人，十分关心子弟的学习，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育之后，便及时地把他送入私塾念书。1903年，王伯祥十四岁，与同学叶圣陶、郭绍虞、章元善结为好友。章的父亲章珏，虽是清代的进士，但思想进步。他痛心于列强瓜分中国，常鼓励后辈立志救国。对王伯祥和他的同学影响更大的是梁启超。他们喜欢读梁的文章，并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王伯祥清楚地记得在他五岁时发生的中日“甲午之战”在他六岁时发生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在他九岁时发生的“戊戌变法”，在他十一岁时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在他十二岁时清廷与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在他十三岁时沙俄迫使清廷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等等，这些震惊全国的

事件在苏州引起街谈巷议的情景，深深刻印在王伯祥的心里，终身未能忘怀。

1906年，十七岁的王伯祥考入苏州中西学堂。翌年，他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这所在新思潮影响下创办的学校，从师资素质、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与中国旧式学校迥然不同。学校前两任监督（校长）是维新派。后来继任的监督为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袁希洛。教员多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他们几乎个个富有朝气。其中国文教员胡石予，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南社诗人。课程除国文外，还有历史、地理、博物、英语、体育、兵操、劳作等。课外活动也很丰富，学校定期组织旅行，去天平山，去无锡，去杭州，平时则由学生自由支配，或阅读翻译作品，或浏览新的报章杂志，使学生有机会不断汲取中外文化营养。王伯祥在苏州中学的好友仍是叶圣陶、顾颉刚等。1908年，他们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放言》诗的启迪，组织诗社“放社”，时时吟诗、嵌字、联句、做对联、练习书法。1909年，他们又创办了《学艺日刊》，中设论说、翻译、诗文、图画等栏，内容充实，令人爱读。在苏州中学的五年间，王伯祥勤奋学习，为他日后从事研究、教学、编辑工作奠定了基础。

王伯祥在苏州中学就读的最后一年，迎来了辛亥革命，那时他二十二岁。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使许多青年对中国政局寄予希望。王伯祥曾投笔从戎，但当他亲眼看到军队中野蛮的军阀作风后便离开了军营。当时就业不易，幸好中学同学吴宾若在苏州角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长，他邀请王伯祥前往任教，王欣然应允。1917年，叶圣陶也应聘到了这所学校。志同道合的好友重逢，促膝谈心，无话不说。大家愉快地回忆起苏州中学的校园生活，谈到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见闻，蔡元培办学的新思想，黄炎培“国文新教授法”的主张，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编教材的体会等。最后，话题落到教育改革上，大家决心从本校做起。于是他们自编课本，开办新书店，创



办农场，开辟博览室、音乐室、篆刻室、修建戏台，使学生扩大了眼界，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

1918年，王伯祥、叶圣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角直镇组织了教育会，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他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并能从教学活动中总结经验。1919年，北大《新潮》月刊创刊号发表了王伯祥、叶圣陶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王伯祥的《拟编高等小学史地教材大纲》也由叶圣陶题跋，在《新潮》八月号上作了评介。

王伯祥博学多识，又多才多艺，在教师中素以熟悉历代掌故、能唱道情京剧、喜爱昆曲评弹而著称。教学之余，他还瞩目于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曾为保存当地古代雕塑而尽心尽力。角直镇保圣寺十八罗汉塑像群，栩栩如生，历史悠久，但长期湮没无闻。王伯祥和叶圣陶游寺时，徜徉于塑像前，称赞不止。天王殿上悬挂的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对联“梵宫敕建宋代，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塑源惠子，为江南佛像无双”更引起了两人对古塑的珍视。他们邀请从北大回乡度假的顾颉刚前往参观研究。顾认为塑像出于唐代大雕塑家杨惠之之手，呼吁社会筹金修缮。后得蔡元培、马叙伦、叶恭绰等的支持，成立了保存角直唐塑委员会，经过培修寺院，改善了古塑的保存环境。

在角直期间，王伯祥、叶圣陶都是北京大学研究国学门的通讯研究员。他们和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俞平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时关心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9年夏，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角直，第五高等小学的教员都为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立即在镇上开会进行声援。不久又发表了《角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当年冬，王伯祥与叶圣陶还创办了《直声》文艺周刊，但不久即停刊，王伯祥也应厦门集美学校之聘，前往福建任教。

1921年1月4日，由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耿济之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

北京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简章》)。王伯祥在集美学校闻讯,毅然入会。他虽然不搞创作,但在后来从事研究编辑的过程中,始终忠实于会章,并与许多文学研究会会员保持着友谊。

1922年初,王伯祥应北京大学蔡元培、马叙伦之聘,任中文系预科讲师。二月,叶圣陶亦应聘为预科讲师,与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结伴到京。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因妻子分娩请假南归,所教国文,由王伯祥代授。北大学术空气活跃,教师人人有专长,王伯祥亦不例外。不少当日的学生如冯至、季羨林、游国恩、陈翔鹤等都被王伯祥深入而生动的讲课所吸引。在北大的一年多时间里,王伯祥与文学研究会在京会员相识,与郑振铎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1923年年初,王伯祥和叶圣陶同时被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一在史地部,一在国文部。1月30日,王伯祥与郑振铎、叶圣陶、顾颉刚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北京国立学校南迁的主张》,声援蔡元培和北京学生与北方军阀、政客及其代理人的正义斗争,呼吁国立学校南迁。3月,郑振铎倡议组织朴社,王伯祥、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等热情响应。为解决新文化书籍出版问题,入社者每月集资十元。5月12日,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文学周报》)决定自73期开始,由王伯祥、沈雁冰、周予同、俞平伯、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谢六逸、顾颉刚等轮流主编。

1924年9月爆发了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战后,为了解军阀混战的恶果,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等结伴赴浏河访问。

1925年,匡互生、丰子恺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后称立达学园)并成立立达学会。教师和学会成员多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叶圣陶、夏丏尊、陶元庆、章锡琛、刘薰宇等。王伯祥

也热心参与活动，后与郑振铎、叶圣陶等被选为立达学会委员。

这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激起人民的愤怒。5月30日，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学生二千余人深入租界，声援工人，要求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逞凶，从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义愤，上万人集中在南京路，要求释放学生，高呼反帝口号，英巡捕又开枪屠杀，时称“五卅惨案”。鉴于上海报纸不能伸张正义，由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倡议创办《公理日报》，王伯祥参与办报，反帝意志坚定。

1926年8月30日，郑振铎宴请鲁迅，王伯祥、刘大白、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等在座，宾主相聚甚欢。

1927年，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形势对苏州造成了影响。王伯祥、叶圣陶等七人受苏州市党部委派，接管当地学校。不久，发生“四一二”大屠杀。苏州教改夭折。王伯祥和周予同、叶圣陶、郑振铎计划主编的大型选本《中国文选》，也因故未能成书。但白色恐怖并未能使王伯祥和新文化运动及其成员疏远。1927年秋，王伯祥、叶圣陶、徐调孚、丁玲、胡也频前往浙江海宁观钱塘江大潮，直至午夜。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郑振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决定编辑他的《海上述林》，王伯祥参与集资出版工作。

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是王伯祥学术上第一个丰收期。他在编写历史、地理教科书之余，还完成了专著多种，并发表了许多论文。他的研究，上起奴隶社会，下至现代，范围广泛。其中著名的论著有《我国三千年地方制度的演变》、《古史辩与经今文学》、《三国史略》、《四库全书述略》、《清史稿述臆》、《辛弃疾的生平》、《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这些论著材料翔实，见解新颖，学术性很强。有的论著还蕴含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2年春，王伯祥应开明书店之聘，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8月1日。1928年发展为开明股份有限公司。

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诞生的一个进步书店。其创办人章锡琛原为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由于刊物发表倡导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的文章和他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不为编译所所长王云五所容。周建人被调离编辑部不久，王云五又以审查清祥为名，干涉编辑工作。章锡琛忍无可忍，愤而辞职。在胡愈之、吴觉农、郑振铎、孙伏园等的支持筹画下，一个后来与商务、中华齐名的书店开业了。它广泛联系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并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它印行的书籍有中小学教材、外语读物、新文学作品、自然科学译著、文史著作等。开明书店亦有《中学生》、《一般》、《国文月刊》、《英文月刊》、《月报》等刊物。编有《开明青年丛书》、《开明少年丛书》、《开明英语丛书》和《开明活页文选》。它还发行《语丝》、《文学周报》、《国学门周报》。文学研究会丛书也由它出版。

先后担任开明书店编辑的大多是重气节操守、态度严肃认真和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如夏丏尊、叶圣陶、赵景深、顾均正、刘薰宇、钱君匋、徐调孚、金仲华、宋云彬、周振甫、周予同、郭绍虞、陈乃乾等。

王伯祥在开明书店除从事编辑、研究外，还兼管经理室的文翰事务，并参加出版规划。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他在开明书店的第一个时期。在短短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是热情支持有学术价值的书籍《辞通》、《元人小令集》等的出版；二是关心自学青年的学习，积极参加开明函授学校的工作。当时失学失业的青年很多，为了辅导培养他们，1932年开明开办了函授学校，校长是夏丏尊。课程设置，文史数理俱全。各科师资力量都很强。如国文科由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任教。算学科由刘薰宇、章克标任教。英文科由林语堂、林幽任教，图画音乐科由丰子恺任教。历史科由王伯祥、宋云彬任教。后来正式出版的《开明历史讲义》就是王、宋合编的；三是主持出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工作。清乾隆时曾刻印从《史

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世称殿版。今人柯劭忞又编纂了《新元史》。这二十五史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探索我国从传说时代到明代历史的必备之书，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天文、文学、哲学、民族、中外交往等等所不可或缺的文献。“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各个学科的发展，用新的观点、方法编写中国通史、断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都亟需古代史书。宋、元、明、清留传下来的刊本满足不了需要，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虽然有其优点，但书价昂贵，不是一般知识分子买得起的，所以，1934年王伯祥及时地提出了出版《二十五史》的计划。他主张二十四史以殿版为底本，因为它们除《明史》外，都有前人的考证，而《明史》也可利用《明史考证彙逸》分编附于各有关传、志之末。他又援引《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收于二十四史之例，主张将《新元史》收入成二十五史。柯劭忞的《新元史》，257卷，1920年成书，1930年修订。作者编纂时广搜博采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元史遗文补正》、《元经世大典》、《元典章》等书的资料，于《元史》多所补正，确可与旧史并列。《二十五史》的学术价值还表现在它的“参考书目”上。它包括各史的版本问题、注释训诂、考证质疑、赏析评论等类。它对研究者具有引导作用。另外，编者考虑到《二十五史》有3516卷，篇幅巨大，决定采用影印的方式缩印为精装九册，既减轻了读者的经济负担，又为广大文史工作者提供了方便，对许多学科的教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二十五史》这历史的海洋，如无索引，检索历史人物将如大海捞针，十分费力。王伯祥为读者、学者着想，让周振甫、卢芷芬在《史姓韵编》的基础上增补改编成《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更能反映王伯祥学识渊博，在史学、目录学方面高深造诣的是他主持编辑的《二十五史补编》。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典范。它通过本纪、世家、年表、八书、列传，成功地反映了我国特定时代悠久而纷繁复杂的历史。后代史家多继承其体

制，有的还有所创造发展，使体制更臻完善，但限于客观条件或史家的水平，有的史书表志不全，需要补写，有的表志需要考证、纠谬、注释。缺少这些，那些史书就会给人留下或大或小的遗憾。顾颉刚先生曾从补编的角度论证表、志的重要性说：“治中国史学者不能舍弃历代正史既如此，而正史中之表、志，于典章之沿革，人事之变迁，各尽其贯穿综合之任务，使读之者对于历史现象有整个之认识，则更为此资源中之真精实髓。原表、志之体创于司马迁，虽亦有所因，而与纪传相辅以作全书之纲领，则其前所未有的也。夫表之为用不仅旁行斜上，而在乎钩玄提要；志之为用亦不惟整齐故事，而在与原始要终。人事前后相循，不容随朝代而割裂，故每代一史，本非其宜；然古今作史者纵自成一家之言，而在读史者视之，则实为绵延相承之作。若一史之中，表、志有阙，则读史者目之所触，惟有林林总总之故事浮出于前，无由得其纲领，而前后相循之人事亦为之断而不续矣！正史不皆有表志。《二十五史》中，表、志齐备者，惟《史记》（称书不称志）、《汉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九种；其有志而无表者，则有《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称考不称志）等九种。自余《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等七种，则并一表一志而无之。此无表无志之七种与有志无表之九种，其不能称为完善自不待论；即就其有表有志者观之，作者之学识与其所取之材料俱未尝无瑕可指。故若曰‘二十五史多缺憾’，此固平心之论，非吾辈之有意轻侮古人也。”（《二十五史补编·序》）古今学者为补二十五史之失，作了许多工作，产生了许多成果。如关于《史记》的有汪越与徐克范《读史记十表》、吴非《楚汉帝月表》、王元启《史记月表正讹》、卢文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王元启《史记三书证讹》、钱塘《史记三书释疑》、孙星衍《史记天官书补目》、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等。关于《宋史》的有宋人《宋中兴三公年表》 万斯同《宋大臣年

表》、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聂崇岐《宋史地表志考异》、倪灿与卢文弼《宋史艺文志补》、王仁俊《西夏艺文志》等七种。关于《辽史》的有万斯同《辽诸帝统系图》、汪远孙《辽史纪年表》、《西辽纪年表》、万斯同《辽大臣年表》、吴廷燮《辽方镇年表》、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等。其他各史也都有补作，也都是必读的或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补作或散见于各地，或珍藏于秘阁、或分载于丛书，或尚为手稿，查阅不易，甚至连著名学者也常有见目不见书之恨。王伯祥先生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编辑《二十五史补编》的计划，既是集补史之大成，又是为史学界雪里送炭，锦上添花。他以周振甫、卢芷芬为助手，经多方访求，得书170余种。印成目录后又向全国许多史学家、藏书家征求意见，复得70余种。顾颉刚知道全书大功告成后，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呼“此真功德无量”，“当为史林永颂”。又说编者“坚毅之忱，使人钦服。此二百余种中，旧有刻本者凡180余种，稿本仅存者得60余种，万斯同、汪士铎诸家沉霾已久之书赖斯而显现，洵可谓近年史学界中一绝大快举！”（同前）

1937年3月，《二十五史补编》正式出版，王伯祥时年四十八岁。正当他设想再展宏图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使他壮志难酬。

对于日寇的侵略，他历来就是反对的，而且早在商务印书馆时他就和上海人民一样曾身受其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企图占领上海，以它作侵华的南方据点。1932年1月28日夜，日寇由租界向闸北一带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挑起了淞沪战争。王伯祥、叶圣陶的寓所都在闸北，他们携家带口仓惶出走。人去屋毁，叶圣陶的书籍埋在瓦砾灰屑之中，王伯祥的图书则荡然无存。劫后，周予同在一本旧书的题跋中记载此事说：“‘一二八’事发，伯祥兄藏书尽成灰烬，而同寓亦被劫掠”，“愤暴日之侵凌，忧民生之多

艰！”(王伯祥《〈汉学师承记〉题跋》引，见《度稼偶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曾予日寇以重创，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日寇虽暂时未能占领上海，但侵略者的肆虐却时时威胁着当地人民的安全。1935年他在《〈元人小令集〉题跋》中记录侵略者的一桩丑行说：“(迁居祥茂里后)遽以邻倭肆凶(时东邻为日侨，一夕逞醉撞门，横肆吼叫，门坚幸未破；翌日，警局反以侨民不必与之计较为词，微讽速迁为妙)，不堪安住。未及四十日，又揭来经纬里，托居雪村所(混儿诞生于祥茂里，未及弥月，即徙经纬里)。流离播越，愠焉如掬。”(《度稼偶识》)而当时王伯祥正苦心经营编辑《二十五史补编》，侵略者给他的骚扰于此可见一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但国民党政府仍持妥协政策，大片国土沦丧。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16日，福州路开明书店总办事处、编译、出版、发行、印刷部门及宿舍，毁于敌人炮火。9月下旬，经理章锡琛、范洗人与叶圣陶等奔赴汉口，筹画内迁。由于敌人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败退太速，交通阻隔，开明书店职工无法全部撤离上海，王伯祥和夏丏尊、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等遂困于孤岛。翌年春，章锡琛返沪在福州路一个小弄堂内的几间陋室里恢复开明书店业务。王伯祥从法租界震飞路住处前去上班，每天步行往返二十余里。他和大家一样，每月仅有生活费二十元，有时不得不以藏书易米维持全家生计。但即使清贫如洗，他也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民族气节，爱国之心未尝一日动摇。1938年3月，他在《梦厂杂著》上撰跋说：“闻官报收复历城，胸中磊块为之暂消一时。”(《度稼偶识》)1945年夏，他在《历代名人家书》上撰跋怒斥那些在“世事日亟，外祸侵袭”的形势下“志在肥家，竟尔变节忘义”之人(同前)。当时上海可以通过香港与内地通信，他不顾个人安危，一直与活跃在抗日文艺战线上的叶圣陶(时居四川乐山)保持着联系。对日伪同仇敌忾之情，使两位旧友友谊愈笃。在漫漫的长夜里，不时给



王伯祥精神上带来慰藉的是郑振铎的来访。二人忧国忧民，放言无忌，胸中郁闷为之一吐。

在令人窒息的敌人包围圈里，尽管王伯祥勤奋如昔，但八年间却仅有《春秋左传读本》一种问世。

1945年，日本投降，去内地的开明书店职工陆续返回上海。王伯祥担任襄理，仍兼编辑和经理室的事务。1946年10月，书店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王伯祥献词，回顾艰难岁月，希望发扬开明书店优良传统。他说：“辛未之冬，室罹倭烽。荡然无归，越居沪东。开明见招，勉以同功。窃不自揆，亦尔奋庸。荏苒岁月，十五年中。拾遗补阙，靡役弗从。同仁过爱，始迄交融。专业见委，不敢怠封。籀典辑史，甘老蠹丛。陈编时出，亦颇自雄。抗战间作，四海辍春。九省鼎沸，摇簏倾钟。长夜不旦，道远任重。行者居者，分涂折冲。八载以还，终见州同！心均迹异，幸守厥宗。新知旧雨，遂合云踪。廿周年纪念，盛会适逢。抚今追昔，能无愧攻！所愿一德，共矢靖恭。安不忘危，乐发备凶。相成相须，明快从容。庶几永保，开明之风。”（《开明二十周年献词》，《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

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变本加厉地实行独裁统治，不得人心，民主运动高涨。郑振铎创办《民主》，柯灵、唐弢创办《周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王伯祥为两个刊物撰稿人之一。当《周报》被迫停刊时，他在“我们控诉”一栏里写了《且等翻过这一页历史》一文对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强烈抗议。

在这一时期，开明书店继续保持着进步的传统，重印、新印了许多好书。钱钟书的《谈艺录》即为其中的一种，是王伯祥和叶圣陶亲自组的稿。

1949年7月6日，王伯祥盼望已久的上海解放到来了。年届花甲的他，带领儿孙久久地佇立在淮海路欢呼解放军入城的人群里，忘掉了疲劳，忘掉了夜雨。

1950年6月，开明书店总管理处迁京，王伯祥举家北上，定